

最近在翻译一本讲时装设计师约翰·加利亚诺和亚历山大·麦昆的书《国王与诸神》，常常被书中英国和法国人之间的傲慢与偏见逗得拊掌大笑。加利亚诺和麦昆都是英国人，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却是在巴黎的品牌里实现的。

1997年，他俩分别担任LVMH旗下两个重要品牌——迪奥、纪梵希的设计总监，法国媒体有些酸，《费加罗报》说这两位是“粗鲁的烤牛肉哥”。这是嘲讽英国人不懂吃，星期天吃个烤牛肉午餐就不得了啦，如此粗放的生活品位哪能拿捏得了巴黎高级时装精致的格调？两个只吃过烤牛肉的伦敦混混来掌管我们最高贵的两个时装屋！你们也配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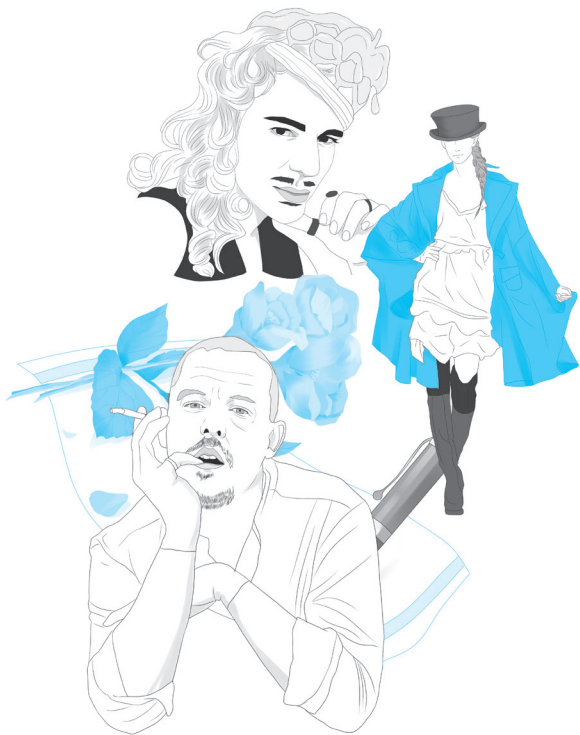
约翰·加利亚诺在Dior的第一个高定“马塞”系列中有款黄绿色的丝绸礼服“苦艾酒”，被看秀的妮可·基德曼相中，希望能穿着它走1997奥斯卡红毯。这

款礼服背部拼嵌了雪尼尔花线编织的网眼，下摆类似旗袍的开衩镶了貂毛。基德曼当时有了个超一线的明星丈夫汤姆·克鲁斯，但自己的名气还在一线和二线之间摇摆。她需要一件别致的礼服来达到宣传效果。当时的奥斯卡红毯礼服很保守，女明星多选择柔和色和黑白色等安全颜色。这条色彩鲜亮的礼服让每个人都承认了她的美，几乎每一个“奥斯卡最佳红毯装”名单都会有这件礼服，也奠定了加利亚诺的国际声誉。加利亚诺很快学会了巴黎老牌时装屋设计师的“领导礼仪”：跟员工沟通时会说，你要干吗干吗，但从不亲自示范。于是员工们抱怨他手里连一根针线都不带拿的。麦昆在工作中亲力亲为，他的手工活超强，一块面料铺在人台上，只需几剪刀、几针就缝制出一条漂亮的裙子。那么巴黎人又怎么说他呢？“顶着他的光头，牛仔裤吊在屁股上，

和一帮穿白大褂的老太太（高定工作坊里的工匠们）一起干针线活。”法国人从来觉得英国人做不好衣服。加利亚诺在伦敦崭露头角后，因为商业上做得不成功一度穷困潦倒，跑到巴黎投奔业内著名设计师。前辈们都跟他说，你做的东西确实不错，但在巴黎人看来还不能叫时装，太糙了。法国设计师有理由骄傲，因为奢侈品的概念、传统和它带来的铺张浮华的生活方式，是凡尔赛宫的法国皇帝们创立的；当然也有人说，现代时装的鼻祖是英国裁缝查尔斯·沃斯，但别忘了，他的时装沙龙在巴黎！时装史里从来都把他划到法国这一块儿。

麦昆在Givenchy的高定首秀的灵感来自古希腊神话“伊阿宋和金羊毛”，所以他让当时最红的男模马库斯·申肯伯格戴着一双大翅膀，打扮成伊卡洛斯（他乘着蜡和羽毛做的双翼逃出克里特岛，由于飞得离太阳太近，翅膀被烤化，坠海而亡）的样子，高高地坐在秀场上方。这个系列以金色和白色为主题。最令人难忘的是娜奥米·坎贝尔展示的这一套造型：金色缎子制成的超短裙，在腰间有个纽结，形成自然的褶皱；她头上戴的羊角出自帽饰设计大师菲利普·崔西之手，但羊角来自麦昆的灵魂伴侣伊莎贝尔·布洛的庄园。

麦昆曾表示喜欢她家养的羊，于是她把羊杀了，取下角，装在袋子里，亲自坐火车送到伦敦。这个系列完全违背了人们对Givenchy和高级时装的期待，被批得一无是处。但我很喜欢，因为抛开艺术性的表达，这个系列中有很多实穿的细节。英国人对法国人也没好话。你说我们的烤牛肉？当英国人评判一块牛肉没烤好的时候，他们会说，“煮得好像一个法国人”。法国人？每



傲慢与偏见的两个伦敦人对巴黎的

□李孟苏

一个都是散发着大蒜味的纨绔子弟。当英国人说了脏话道歉的时候，会说“原谅我说了法语”……凡是不道德的、恶劣的行为，就得怪到法国人头上。

英法两国是表亲，但也缠斗了几千年，爱恨交加。英国人爱法国，对法国人的生活方式、葡萄酒、食物、气候既羡慕又嫉妒。大旅行时代，一老一少两位英国旅行家在加来港下了船后，年轻人用手帕捂住鼻子说：“味道真难闻呀！”那位见多识广的老手说：这就是大陆的味道。英国贵族骂完塞纳河像臭水沟、咖啡馆肮脏蹩脚、教堂里的画太低劣后，伟大如约翰逊博士，也会脱下在英国穿惯的褐色外套、黑色长袜和朴素的衬衣，换上白色长袜和新的礼帽，戴上精致的法国假发，还决定只说拉丁语，不讲法语，以免法语讲得不够准确、优雅而丢人。心态的微妙之处就在于，英国人的文化优越感让他们潜意识里觉得法国人没有权利住在法国。普罗旺斯、蔚蓝海岸，那是我们后花园萨里郡的延伸。可见，傲慢和偏见从来都是人性，最容易操作也是最安全

的那一种，就是地域优越感和地域黑。

加利亚诺发自内心的热爱巴黎，他认为伦敦死气沉沉，在巴黎做个穷人都有波西米亚的浪漫气质，不像在伦敦，穷人只能是奥利弗·退斯特那等寒酸的流浪儿、扫烟囱小子。他善于妥协，懂得进退，迅速用闲聊、撒娇、适当的拍马屁和小精灵般的甜美笑容博取了巴黎社交圈、媒体的接纳和喜爱。他老板，LVMH集团的主席阿尔诺也喜欢他，在服装和新装秀的制作成本上满足他的一切需求。

巴黎帮他攀上了名利的巅峰。麦昆却很抵触巴黎。他批评巴黎设计师的作品是给一堆五颜六色加上锁子甲，这帮老朽就像出演迈克尔·杰克逊《颤栗者》MV的僵尸。他能不去巴黎就不去，甚至会为了不坐飞机而编造孩子气的理由。他性格桀骜不驯，脾气暴躁，极为叛逆，不似加利亚诺那般世故圆融、善于逢迎。他的老板也是阿尔诺，而阿尔诺怎么对付他呢？阿尔诺明明会说英语，但他就是不对麦昆说英语，一定要手下人翻译，当然

麦昆也坚决不学法语。这样他们之间的交流就非常受限，只能就工作问题泛泛而谈，完全没有私人话题。

这两个英国人对巴黎的态度，恰好代表了巴黎和伦敦的城市性格。二战时期巴黎不战而降，当然他们借口是让巴黎躲过了战争的浩劫；被占领期间，大品牌继续对侵略者出售奢侈品，也有积极一面，那就是为战时的法国创造了就业机会，保护了巴黎时尚这一璀璨的文化瑰宝。宁为玉碎、不为瓦全？巴黎做到了璋瓦俱全。伦敦宁为玉碎，以死抗争，纳粹的闪电战把伦敦炸成了废墟，人民还是要气定神闲地喝一杯茶的——丘吉尔说，茶叶和军火一样重要，他向民众保证政府设置了500个秘密地方储存茶叶，足以保障茶叶的供给。

领导英国人取得二战胜利的是丘吉尔首相。麦昆和他一样都有敦实的约翰牛体格，只是麦昆在40岁自杀，人生战役中早早阵亡。但我们怎么能说他是败将呢？

(图/李倩莹)

面对孩子

□余秋雨

那天，我在以色列。教堂门口出现了一队队小学生，穿着雪白的制服，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路唱着悦耳的圣诗。老师倒着身子步步后退，以笑脸对着孩子，用脊背为孩子们开路。周围的人群为他们让出了一条道。

这幅画面，也就是“面对孩子、以退为进”的动态造型，这让我突发联想，浑身震颤。上一代身上已经储满仇恨，如果只让孩子们跟在自己身后，追随自己，那就是仇恨的世代延续。如果上一代能转个身，放弃自己原来的方向，让孩子的目光成为方向，那将如何？

历史的结论，往往由孩子们做出。

安徒生久久地缺少自信，他不仅出身贫寒，而且是小语种写作，是否能得到文学界的承认？他很忧郁，一直想成为当时比较有名的奥伦斯拉格那样的丹麦作家，却受到各方面的嘲笑。不止一位作家公开指责他只会讨好浅薄浮躁的读者，结果，连他的赞助人也终于对他完全失望。

其实，他早已成为一个文学巨匠，那些他所羡慕、害怕的名人，没有一个能够望其项背，更不必说像奥伦斯拉格那样的地区性人物了。

原因是，他建立了一个从人生起点开始的坐标。结果，全世界的孩子为他投了票。

一切装腔作势的深奥、自鸣得意的无聊，可以诓骗天下，却无法面对孩子。